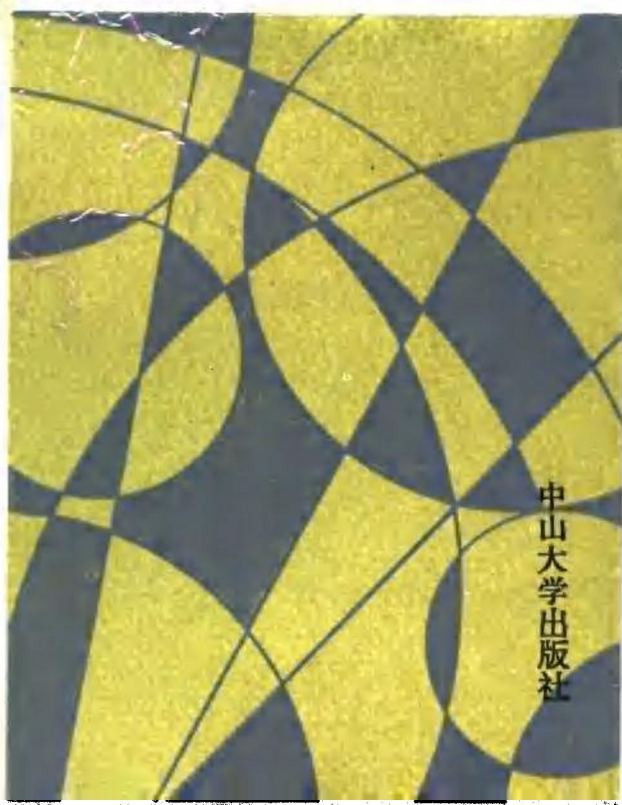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学  
社会科学系列  
学术丛书

# 纪念梁方仲教授 学术讨论会文集

汤明燧 黄启臣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K825.4  
191

2

BD23/25

中山大学学术丛书  
——社会科学系列



# 纪念梁方仲教授 学术讨论会文集

汤明棣 黄启臣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713357

**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

汤明棧 黄启臣 主编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33.6万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册

ISBN 7-306-00283-x

K·37定价：9.20元

421



梁方仲先生

## 前言

中山大学 汤明樾

梁方仲教授（1908年7月19日—1970年5月18日），广东番禺人，当代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明清史学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奠基人。他把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建设。

由于少年时家庭的熏陶，梁先生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青年时代，他在（“五四运动”后）京津地区就读，深受新文化浪潮的激荡，嗣后与吴晗、罗尔纲、汤象龙、谷霁光等青年学者立志改革中国史学，使中国史学研究走向现代化、科学化。

在数十年的教学、科学研究中，梁先生倡导严谨、求实、探微、创新的学风。他追求真知灼见，反对依样画葫芦。他勤奋过人，珍惜时间，不图名利，一生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喜欢与朋友、晚辈、学生共同讨论学术问题，互相切磋，努力创造一个探求、思考、钻研、论辩的学术气氛。在史料或理论的运用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的治学态度，给后辈留下了严师益友的典范。

梁先生的知识十分渊博。他在中国历代户口管理和土地、财政和赋役等制度方面的研究贡献最大。他的著作早已为国内外学者推为典范。在这本论文集中，李文治先生作了详细的评介，很值得一读。梁先生对制度史的研究有他独特的风格，他从不静止地、孤立地研究一种制度，而是纵横联系，把握制度时空演变的轨

迹，并且把制度条文与实际推行的情况跟踪追究，最后再评价其社会效益。在更深的层次，梁先生进而考察某些制度会在短期内产生效益，但过了一定时期便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他以财经制度研究为基点，逐渐扩展到对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探究，发掘出明清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本色，进而比较14世纪以后中国与西欧社会不同的历史进程，并指明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育不起来的病根。梁先生著作的许多论述，极富有历史启示。在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中，我深感到，开展对明清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将会对当前我国的规划经济发展战略与改革经济体制起促进作用，并具有鉴往知来的现实意义。了解历代的国情，将会加深对现在国情的认识。

这本文集的出版，得到梁方仲教授就职岭南大学经济系主任时培养的高足、现英国快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振西先生及其夫人邝瑞瑛女士的赞助，谨志谢！

# 目 录

|                         |       |         |
|-------------------------|-------|---------|
| 前言                      | 汤明棧   | ( 1 )   |
| 纪念梁方仲教授                 | 朱杰勤   | ( 1 )   |
| 忆梁方仲教授                  | 罗尔纲   | ( 3 )   |
| 辛勤耕耘, 卓越贡献              |       |         |
| ——追忆梁方仲教授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     |       |         |
| 李文治                     | ( 9 ) |         |
| 梁方仲——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         | 周秀鸾   | ( 26 )  |
| 回忆梁方仲教授二三事              | 李龙潜   | ( 32 )  |
| 梁方仲教授指导研究生学习的方法与特点      | 鲍彦邦   | ( 41 )  |
| 梁方仲教授与吴晗                | 黄启臣   | ( 50 )  |
| 梁方仲教授对中国计量史学的开创性贡献      |       |         |
| ——兼论中国古代官方统计数字对经济史研究的作用 | 陈支平   | ( 53 )  |
| 清道光改革漕制议                |       |         |
| ——江南农村经济变化漕运体制矛盾加剧与议行改制 | 李文治   | ( 61 )  |
| 明清赋役改革与官绅地主阶层的逆流        | 彭雨新   | ( 95 )  |
| 从清代手工业所见佣工的雇佣习惯与形式      | 彭泽益   | ( 112 ) |
| 论康熙时期从海禁到开海政策的演变        | 韦庆远   | ( 121 ) |
| 论汉代土地所有制的两重性与土地私有制的时代特点 | 杨生民   | ( 137 ) |

|                                |     |       |
|--------------------------------|-----|-------|
| 明代家丁之起源及特质·····                | 马楚坚 | (151) |
| 中山县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             | 叶显恩 | (192) |
| 明清时代福建的易知由单和自封投柜制度·····        | 陈支平 | (215) |
| 明清时期两广的商业贸易·····               | 黄启臣 | (230) |
| 明清时期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             | 黄国强 | (252) |
| 明清徽商心理研究·····                  | 唐力行 | (268) |
| 广东摊丁入地新论·····                  | 刘志伟 | (292) |
| 清代广东的社仓                        |     |       |
| ——清代广东粮食仓储研究之二·····            | 陈春声 | (308) |
| 外国资本主义侵夺粤海关主权的<br>历史考察·····    | 戴和  | (333) |
|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田赋改征<br>实物成效显著·····  | 崔国华 | (348) |
| 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br>综述·····        | 戴和  | (365) |
| 附录一：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br>讨论会的贺信贺电····· |     | (373) |
| 附录二：梁方仲诗词·····                 |     | (376) |



# 纪念梁方仲教授

暨南大学 朱杰勤

梁方仲教授是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享有国际声誉。他的大作《一条鞭法》，早在本世纪40年代的美国就有英文译本，获得好评。他在岭南大学及中山大学任教二十年，育才无数，在教学上和科研上均有突出的贡献。他的品德和成就，都值得我们学习。今天，在中山大学举行纪念梁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是有重大意义的。我在年青时候已在报刊上读过梁方仲先生不少文章，印象颇为深刻，但是还没有机会向他请教。1933年，我在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当研究生时，认识了梁方仲令弟梁嘉彬先生，略知道方仲先生的家世。1952年，我由昆明调回中大历史系任教，才有机会和梁先生共事。虽所学不同，但经常交换意见。我从梁先生处学到不少东西，对他有更深的了解。他虽出身于名门望族，又出过洋，但生活极为俭朴，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同志宽厚而且虚心。以读书、交友、著述，讲学为乐事。明辨是非，和而不同。自信心强，但从不自负。对人肯提意见，且讲究方式方法，忠告而善道之。所以我们都把他当为益友和诤友而乐与之亲近。

梁方仲先生治学，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代表作，我认为是《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古语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经济学史的任务是研究历代的人类与财富的关系及其因果。梁先生此书研究人口、田地（土地制度）和赋税。这几种因素互相关系、互为因果。人

是最活跃的生产力因素。开辟土地和开发资源都靠人。土地就是财产，官府为了管理人口和土地，于是有户籍法和土地制度的设立。有了土地，才有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总之，梁先生这部巨著包括了经济史中的主要问题，即国计民生和人与财富的关系，是梁先生以他许多专题研究的成果为基础而写成的。这部大书为广大读者提供大量很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和数据，确是必传之作。

梁先生不仅是一位独树一帜的中国经济史学家，而且是一位诗人。他对诗学极有兴趣，而且造诣亦高。他的诗稿有一二百首，以律诗和绝句为多，极少流连风景及应酬唱和之作，好用典故，但不流于雕琢。他以叙事以诗，自视为小技，不愿公开发表。就诗的素质而论，自是高手。史学家能诗者不多，梁先生之诗，可取之处极多，我希望有人把他的诗整理出版或附在文集之后作为纪念。

梁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真研究，他曾将马克思《资本论》中论原始积累的秘密的一章作了读书札记，从而搞清西方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问题，又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探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主张以钻研经典著作，吸收其精华作为指导思想，反对时俗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不求甚解，生吞活剥的贴标签的教条主义。

1988年12月5日

# 忆梁方仲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罗尔纲

梁方仲教授毕生研究中国经济史，著述甚富。他对一条鞭的历史，发前人所未发，蜚声国际。在历史研究上，他应用数字统计奠下基础，厥功尤大。他1949年回中山大学任教后，对青年循循善导，至今岭南桃李成林，影响深远。今年中山大学纪念他，其意义重大。关于他的重大贡献，已有同志详述，我在这里只说说他对我的帮助，以及我的体会。

1934年，我和梁方仲教授同编《史学》副刊，1936年我兼任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1937年秋，我转入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方仲共事前后14年，风雨同窗，共同研讨。

方仲同我论过通人。他说：“专家多有，通人难求。”我说：“梁启超是个通人，人们都可惜他不曾写下一部中国通史。”方仲说：“陶孟和先生也是个通人，当今还想不出第二个。”陶孟和先生专攻社会学，他对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以至地质学、天文学无不通晓。但我还不知道他也很熟悉文学。有一次夏夜乘凉，闲谈中，他问我近来看什么书，我说正看哈代（Thomas Hardy）的《苔丝姑娘》。他听我说看哈代著作，就给我说了一番哈代的历史、创作经过和其成就。我以前觉得哈代小说布局十分匀整，与其他作家不同，到听了孟和先生说他做过建筑师助手，才理解哈代是把建筑艺术用到文学创作来。方仲说孟和先生是个通人，我认为是知言。

梁方仲教授在陶孟和先生创办社会调查所时就来工作。他专攻经济学，而博学多能，是陶孟和先生培养出来的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也正是一位难得的通人。我研究文史，他就经常帮助我。

我研究过清末作家吴沃尧代表作《九命奇冤》。这部小说的本事是清嘉庆五年（1727年）广东一件大命案。这个本事（见于60年后，根据传说来写的欧苏《鹄楼逸志》卷五《云开雪恨》篇），经我稽考，多与史事不合。方仲是番禺的世族，他的家乡，正是这件大命案产生的番禺县的黄浦乡。我因向他请教，他说：“这件大命案流传下来的口碑，而今还是有的。现在番禺县属有些地方，梁、凌还是不通婚，据说其起因便是由于这件大命案。但却不是处处都是这样，如我的高祖便娶番禺县深埗乡凌氏太夫人，又我的六世祖也娶凌氏。”后来我在同治《番禺县志》卷五十四杂记里看到一条记载。这条记载是替凌贵兴辩诬的，其全文如下：

世传梁天来七尸八命事，皆诟罪于凌贵卿，而苏古侪（珥）赠贵卿子汉亭诗曰：“九疑风雨暗崎岖。八节波涛险有余，世路合裁招隐赋，俗情催广绝交书，传闻入市人成虎，亲见张弧鬼满车。旧约耦耕堂愿筠，平田龟诉又何如！”凌后人名扬藻有答黄香石书，辨此事之诬尤详。

这一条记载注明“据《粤小记》，采访册参修。”我又向方仲请教。他说：“这条短短的记载，是很值得重视的，从其中已经看出这个传之民间见之著作的《九命奇冤》本事的核⼼。所说的黄香石，有诗名，世称与谭康侯农部、张南山太守为粤东三子，即先祖母周太夫人的外祖父。凌氏既有后人给他们的先人辨诬，则凌贵兴之实有其人可知；再从另一方面看，七尸八命这一件大命案，为实有其事可知，梁天来之为实有其人可知。问题只在于世

传梁天来七尸八命事为凌贵卿所为，而凌子汉享有友名苏珥者为其赋诗叹人情的险恶，对此事极力认为是被人陷害的，凌后人复有辨诬之举，目前文献不足证，则我们对这一件大命案的案情之是非曲直，自应以疑传疑为是。”方仲对问题判断的敏锐，治学精神的谨严于此可见。方仲不仅指点了我，他还牢牢地把这问题记在心里。那时社会调查所在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两处所藏清代档案发掘经济史料，每天有几十个人员长期工作，方仲与汤象龙教授领导这个工作，他们也亲自来发掘。大约两年之后，有一天，我正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室量拓本，突然，方仲急遽地把房门推开，满脸喜色。原来他已在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室档案里给我找到了两件《九命奇冤》凶犯穿腮七的档案了！一件是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二十二日署理广东巡抚鄂弥达的题本。一件是乾隆二年十月十四日刑部尚书徐本的题本。这两件题本，都是奏陈审结广州府南海县强盗穿腮七打劫顺德县江乡民蔡绘群案而旁及打劫梁天来家烟死多命等案事的。据这两件题本，可以证实《九命奇冤》所根据的梁天来兄弟家大命案的事是确实有的。打劫梁家的凶犯为强盗穿腮七等，强盗行凶是用火熏攻，致烟死多命，都是确有其事的。并且据鄂弥达题本，知穿腮七放火烟死梁天来家人多命一案，经鄂尔达亲自“审似斩梟刺字，现在另疏具题”。只要鄂弥达这封题本尚存，总会有一天发现，可以看见全部案情的。当时我把这两件档案在《史学》上刊出。几十年来，研究到《九命奇冤》的人们，都引以为据。这是梁方仲教授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搜查出来的，请毋忘他的辛劳。方仲一生，帮助朋友，帮助学生做研究工作都是这样。

方仲对我研究工作帮助最大的是我改变纪传体为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我于40年代用旧史纪传体写成一部《太平天国史稿》。纪传体用本纪记君主统治事迹，用表驾驭复杂繁颐的史

事，用志详记政制，用列传记人物。这种体裁，以“类别区分”为原则，其优点是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类可归和寻求方便。但缺点是记事分散，大纲要领、观者茫然；尤其是以人物为本位，宣扬君主统治，宣扬将相业绩，历代封建王朝所修正史都用这种体裁，为封建主义服务。我从1951年夏起，经过艰苦的探索，一步步地深入的认识，直到1984年，才改成为一个以多种体裁组合而成的综合体史书新体裁。我增加了“叙论”，以概括全书，另立“纪年”，专记大事，取消了宣传君主统治具有浓重封建性的“本纪”，把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的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旧体裁，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传组成的综合体史书新体裁，根本改变了纪传体的性质。在这个探索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如何取消纪传体的浓重封建性与偏于记述人物，突出个人，掩盖人民群众这两项大弊病。我对此苦思了多年，想不到办法。于1960年前后的一个秋天深夜，方仲路过南京（我们分别已经十多年了），匆匆来家一见，我就把我的困难告知他。他毫不迟疑，立刻说：“问题从洪秀全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就要从洪秀全去下手解决问题。”他一句话提醒了我。我送他走后，在星光暗淡的庭院徘徊，一边思考。我想：将洪秀全、洪天贵福移入列传部分，把本纪取消，不就把纪传体浓重的封建性消除了吗？但本纪“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它具有编年和尊君的两面作用。尊君这一面封建糟粕固然必须剔除，撰史首重纪时，编年这一面却如何处理呢？我走向工作室，伏案思索，想了一回，起来在书架上抽了几部书来查，最后想通了，决定取消本纪，改为专记国家大事的编年，采用中国古史的称谓，称为“纪年”。这样，取消了本纪，改为“纪年”，就把纪传体浓重的封建性消除了。以前，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记人物的本纪、列传占了全书四分之二。表、志只居于从属地位。现

在，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也就把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性质改变了。苦思多年未能解决的大难题，得到方仲指点迷津。一旦解决了，<sup>〔1〕</sup>这个综合体史书新体裁，如果经过今后史家的试用而得到认可，那是在中国一大贡献，都出于方仲的识见宏通。

方仲不仅学识过人，他还是个一丝不苟的谨严学者。1938年夏天，当时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迁在广西阳朔，我写成了《湘军新志》，请他给我看看。其中引有清道光时人桐城派大家梅曾亮《上方尚书》信中的一段话，初时标点如下：

窃念国家炽昌熙洽，无鸡鸣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于今。东西南北方制十余万里，手足动静视中国头目，大小省督、抚开府持节之吏，畏惧凛凛，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属吏，递相役使，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非从中复者，虽小吏毫发事，无所奉行。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伦比。

方仲看了，指出“其符檄下所属吏，递相役使，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非从中复者，虽小吏毫发事，无所奉行”这句话标点有问题。我问他问题在什么地方，请他改。他却说不出来。当时心理研究所也同迁阳朔，唐肇黄（钺）先生在心理研究所，他是位心理学专家，又精通国学，曾有国学专著出版，他还是方仲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于是我们两人就同往求教。他看了我的稿，放了下来，想了一想，又拿起来再看一遍，他说：“这个句子所以看起来不很清楚，那是因为在‘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下用了逗号，如果改用分号就清楚了。”我们照他的指点去改。果然如此。这个故事，表明方仲做学问一丝不苟，连一个逗号与分号之间的小小差池都不肯放过。他自己要求严，对朋友也同样要求严。

方仲极重友谊，他遗嘱：他的著作出版都送老朋友一部。我承

他的儿子梁承邨同志送了他的大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等书。我珍藏了起来。我珍惜我们的友谊，我珍惜他的心血结晶。这些心血结晶，也将为千秋后世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所共同珍惜！

**注：**

〔1〕 详见罗尔纲：《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 辛勤耕耘，卓越贡献

## 追忆梁方仲教授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李文治

### 一、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情操

#### 1、幼年爱国主义思想

梁方仲先生生于1908年，原籍广东番禺。在清朝，先祖世代读书、应举入仕。民国时期，父亲在大学、中学执教三十多年，梁先生自幼生长在这样一个读书世家。

梁先生于1921年到北京汇文小学读三年级。1922年跳级进萃文中学，1923年转入北京崇实中学。1925年，“五卅”惨案掀起全国的反帝高潮，崇实中学也不例外。但该校系由美国教会创办，对学生实行压制，梁先生毅然离该校转入天津南开中学以示抗议，表现了一个爱国青年的义愤。

1926年，梁先生十八岁便以高中一年级学籍跳级报考北京清华大学农学系，最后转入经济系。1930年毕业，继入清华研究院。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略东北，梁先生即参加由曹禺先生带领的清华大学抗日宣传队，前往保定、定县、石家庄一带宣传抗日，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

#### 2、由爱国主义到倾向共产主义

1939年，即梁先生三十一岁的那一年，他开始和共产党接